



中国现代名人演讲选粹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演讲初创期历史 的简要回顾

我国近代第一个提倡演讲术的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1891年，他以布衣的身份上书皇帝主张变法失败后，应梁启超和陈同甫的邀请，在广东省城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学校，在给学生进行全新的德、智、体教育之外，还每月给学生上两次演说课。而见诸报端的中国近代第一篇演说，是康有为在1898年5月27日发表的。这一天，保国会在北京粤东会馆第一次集会，到会者二百多人。康有为在演说中痛陈亡国瓜分惨祸之迫在眉睫，回顾洋务运动发展之迂缓无力，激励公卿士大夫效法日本维新志士一定要前仆后继，争取维新变法的完全胜利。据梁启超记载，当时来听讲的“朝官自二品以下以至言路词馆部曹及公车数百人，楼上楼下皆满座，康有为演说时，声气激昂，座中人有为之下泪者”。这篇演说，被梁启超全文抄录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载天津《国闻报》。

保国会第二次开会时，梁启超发表了《保国会演说词》，在这篇演说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在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的当时，满朝士大夫却置国家民族命运于不顾，借口“天心国运”，“缓不及急”，反对变法图强，实际上是坐以待毙的亡国谬论，号召有识之士奋发振作起来，团结四万万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只有

这样，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

1899年8月26日到12月23日，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其所办的《清议报》上连载了他的《自由书》一文，在“传播文明三利器”一节中，他回忆说，近代第一个政治社团强学会1895年8月经康有为创办以来，各省出现了一批社团，然而当时中国人尚不明白外国的“会”有好多种类，所以把学会、政党、协会、演说会混为一谈。因为宗旨不定，条理错杂，所以很难区分，而守旧派又把这些“会”都当做秘密结社，于戊戌变法失败后一齐予以取缔，可见，当时并没有演说会产生。梁启超引日本人犬养木堂告诉他的话说：“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日本演说之风，创于福泽谕吉氏（案：福泽氏日本西学第一之先锋也，今尚生存，为一时之泰斗），在其所设之庆应义塾开之，当时目为怪物云。此后有婴鸣社者，专以演说为事，风气既开，今日凡有集会，无不演说者矣。虽至数人相集宴饮，亦必有起演者，斯实助文明进化一大力也。我中国近年以来，于学校报纸之利益多有知之者，于演说之利益，则知者极鲜。去年湖南之南学会，京师之保国会，皆西人演说会之意也。湖南风气骤进，实赖此力，惜行之未久而遂废也。今日有志之士，仍当着力于是。”这是近代中国最早见诸报端提倡演说的文字。而戊戌变法前北京的保国会和湖南的南学会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运用演说传播新思想，扩大维新变法人才队伍的政治社团。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实行白色恐怖，随着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戊戌六君子走上刑场，一切维新活动都被取缔。然而清政府之反动已成强弩之末，它的政令在京城以外已经没有什么约束力了。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1901年自立军起义，这个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已经衰弱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

因此，在一些开化较早的南方学堂里，演说仍然受到重视。

1901年8月蔡元培辞官南下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该公学新设一特班，招生三十余人，授以英文、政治和理财等学，以备今后保送当时清朝中央的经济特科的选拔。特班课程，半日读书，半日习英文及数学，间以体操。课外，鼓励学生学习演说和国语。可见当时新式学校十分重视演说的训练。这年11月22日，蔡先生与黄仲玉结婚，举行演说会代闹房，来宾、新郎的贺、答词均发表演说，或标榜男女平等，或鼓吹互相竞赛，可见当时演说之风气已大开。

1903年4月，蔡元培与爱国学社的教员和学生和张园举行演说会，激发民众的爱国思想。1903年4月12日《苏报》转载西报所记张园演说的消息一则：“《字林西报》云：日前张园连日开会议论国事，颇足发人爱国之诚。上礼拜四所开者，乃得东京留学生电述广西警报而起，到者千二百人……先由蔡君某演说：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继乃分派在座者章程各一纸，次由马君某请在座诸君同唱爱国歌……忽得东京来电云：俄祸日亟，留学生电北洋主战，组义勇队，愿赴前敌……龙君某乃对大众宣言曰：‘吾辈中国人耶？闻留学生如此举动而忍坐视以放弃天职耶？有表同情者，请从吾坐草地向东鞠躬，以致留学生之爱国心。’言毕，乃首出向东立，从之者几罄坐，乃成列相行礼……议编义勇队，以应留学生。临时签名者甚众。乃复电东京，表爱国之忧，始散。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这里对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一个演说会盛况记载是令人鼓舞的，而蔡元培先生则是发起人和主讲者。

与蔡元培提倡演说同时，1902年在日本留学半年回到家乡安徽安庆的陈独秀，与武备学堂学生柏文蔚，安徽大学堂学生郑赞丞、葛渭仲、何春台等人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并在安庆城

内孝肃路北正街创办了藏书楼，开辟图书室，展出革命书刊，又发起组织了演说会，他和葛渭仲等人发表爱国演说，进行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陈独秀被列为首犯加以追捕，被迫再度逃亡日本。

1903年4月29日，由钮永建、秦毓鎏等人发起，成立抗俄义勇队，5月，清廷下令解散义勇队，陈独秀与邹容、张继闯入留学生监督姚文夫家中，把姚的辫子剪掉，由此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回到安庆后，陈独秀在5月17日组织了一次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爱国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抗俄。号召大家团结奋斗，齐雪国耻。他用自己在东北亲眼看到的事实，控诉了沙俄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暴行，他的演说“词情慷慨，满座歆噓”。5月22日，上海《苏报》报道了开会消息，26日，该报发表了他的演说词，署名陈由己。

在当时一些著名学校里，如周恩来所在的南开学校，胡适曾经就读的上海澄海学堂和中国公学，同样，演说成了学生的热门。

迫于日趋强大的民主潮流，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又命政务处筹备订立宪法大纲，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之后，清廷不得不在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日起有功，尤其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声势日益壮大，从1907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八次起义，大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各地民众自发的反清运动也风起云涌，单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就达七八十次之多。因而这一时期也成了清政府无法控制局面的放任时期，反清的革命活动在一些新式学校中也十分流行，演说就成为最有力的宣传手段。

旧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而宣传群众必须突破文言文的羁绊，于是兴起了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后的

前白话文运动（区别于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当时，全国先后创办的白话报纸有上百家之多，这一白话文运动与当时兴起的演说热相得益彰。当时，甚至有专门的演说报纸创刊。《东方杂志》1907年5月7日出版的四卷三期所刊《各省报刊汇志》中，曾有如下记载：

“山西：晋省僻处西北，素号闭塞。自数年前创设《晋报》后，风气渐开，近更有《讲演白话报》之举，即附属于《晋报》，按期发行外，府州县各慎选热心士绅，分执报章，在通衢随读随讲。事经晋抚恩艺帅竭力提倡，通飭各属一律遵办。”

一省的巡抚提倡讲演，虽然少见，但至少可以看出清廷预备立宪后大大推动了演说之风，北方的偏僻省会尚且如此，南方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这个时期的著名人物，仍然是用文言演说的，有的人也半文半白，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名人演说，多在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文言演说。这一时期的演说大家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等，而这一时期的白话演说却很少保存下来。

辛亥革命成功后，虽然建立了国会，按理说，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争取选票的最有效工具的演说应该走向繁荣，但是，政权操纵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手中，国会只不过是军阀手中的玩物，而当时的议员大都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众投票选举，因而，资产阶级革命家们也没有想真正地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他们仍然用文言发表演说，表达政见。这时，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的演说集一时之盛。而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归国后，立即陷入繁忙的演说活动之中，这主要是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想拉拢梁来壮大声势，依靠袁世凯，和国民党相抗衡。他在1912年10月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到京后，“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每日必有演说，内中以报界欢迎会、民主党欢迎会、共和党欢迎会三处为

最长，想在报中次第见之。此三次之演说，其势力之伟大，未可量也，然演说时亦颇劳苦矣”。1912年12月张君勱、蓝志先辑《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出版，收梁这一时期的演说十三篇，这是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文言演讲集。

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揭开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序幕，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虽然也提出了对新文学的内容方面的要求，但实际上是一次文体的革命，即白话文运动。两千年的言文分家，临到突然要求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时，倒把当时的文人们难住了，他们中除了一部分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白话文外，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是不会白话文而持怀疑态度，在怎样建设白话文学方面，胡适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他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首先提出了白话文应遵循的四项原则：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但是，中国地域广大，方言众多，没有统一的国语，说的话，写的文章仍然是方言的。为此，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指出：“国语不是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他进一步指出：“所以我认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话来补助。有不

得不用文言文的，便用文言文来补助。这样做法，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愁没有标准白话。”胡适的这些主张，今天看起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确实解决了文言文废去后白话文如何写的问题。

白话文运动仅仅找到了一种新的“工具”，倘若没有“五四”运动的推动，只靠几个、几十个人的提倡，白话文之普及是遥遥无期的。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席卷全国。这一年，至少出版了400种白话报刊。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小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1920年秋季改用白话，接着小学三年级以上，中学、大学也陆续改用白话教学，白话文运动算是初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白话文的普及，给方兴未艾的演说带来了新的生机。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对顽固守旧的北京大学进行改革，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一时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讲演运动也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1918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出“学术讲演会启事”，认为“我国近年所以士风日敝，民俗日偷，其原因固甚复杂，而学术消沉实为其重要者一因，教者以沿袭塞责而不求新知，学者以资格为的而不重心得，在教育界已奄奄无气如此，又安望其影响及于一般社会乎？”因此，该会请国立高等学校各教员以其专门研究的学术分期讲演，从而唤起国人研究学术的兴趣而力求进步。该会发起人为蔡元培、张谨、陈宝泉、汤尔和、金邦正、吴家驹、洪镛，并公布了该会2月24日第一次讲演的三位教授及其讲题：由陈大齐讲现代心理学，陶履恭讲社会与教育，王星拱讲燃料。其实，当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术讲演活动一呼百

应，早在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集会一览表”上，2月21、22、23三天，就有胡适之讲修词学，刘筱珊讲老庄哲学，威尔逊讲19世纪散文和戏曲，陈伯弢讲儒家玄学，章士钊讲论理学等。从此，学术讲演活动每天都有，每次至少有2—3个教授讲学。北大学术讲演会是中国现代讲演史上第一个讲演社团，由他们发起的北大校园的学术讲演活动动员教授之多，讲演学科之众，持续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而这种学术讲演的风气从此也一直保持了下来。正是这个时期，《北京大学日刊》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发表讲演的刊物。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此时，段祺瑞重掌国务院，由于段是力主参战的，因此，对于协约国的胜利，段自然认为这是他的功劳，因此，组织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

1918年10月4日，由王宠惠、张嘉森组织的国际研究社邀请协约国在远东的名人和北大学者举行12次“欧战演说”，以期增进国人对欧战的认识和世界观念。英国的海德勋爵，美国的韦罗贝博士和北大校长蔡元培、教授叶景等等发表了有关欧战的讲演。

为庆祝协约国的胜利，北京大学连续在11月14、15、16日放假三天。14日，北大全体师生参加了北京的学界游街大会，15日和16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讲演大会，蔡元培、陈独秀、王建祖、胡适之、陶孟和、马寅初、陈惺农、李石曾和来宾丁文江、冯执中作了讲演。蔡元培两天以次作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为题的讲演，胡适之作了《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讲演，马寅初作了《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的讲演。

十天之后，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战胜又举行了第二次讲演大会，时间为11月28、29、30三天，地点在中央公园，李大钊作了《庶民的胜利》，陶履恭作了《欧战之政治》，岳绍武作了

《民国以来政治纷扰之原因》、江绍原作《协约国之胜利为中国文化之胜利》等讲演，廖书仓等及学生代表多人亦发表了演说。

1918年11月28日，北洋军阀政府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举行了大总统阅兵式，又于当晚举行了北京部属各校学生全体参加的提灯会游行，规定学生队伍经过议院、总统府、参战督办宅及协约国各公使馆前均要止步三呼万岁，一时举国若狂，把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

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中国现代第二个讲演社团。

北大平民讲演团的成员，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发起和参加的有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邓中夏、黄日葵、张国焘、高尚德等。1920年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讲演团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由开始时“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逐步改变为宣传共产主义，扩大爱国影响服务了。该团的主要工作方法，就是定期向北京市民、工人、农民演讲。一般一个时期都有固定的讲演所，由专人利用下午或晚上进行每周三—四次，每次一至二小时的讲演。讲演的内容，除一些关于时事问题的宣传外，主要是介绍一些普通科学和生活知识。讲演团也曾去长辛店、丰台等农村对农民进行露天讲演，但因农民文化太差，讲演人口音难懂而收效不佳。

1920年底，邓中夏以讲演团的名义到长辛店与工人接头，决定提倡贫民教育，开办劳动补习学校，举行定期讲演。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未诞生前建立的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这时，讲演团的工作重点就放在长辛店，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演讲团还与其他团体共同召开某些纪念大会，为罢工工人募捐，发起示威游行等，反对当时的北京

政府。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讲演团利用1923年底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的机会，组织过中国现代第二次民意测验。根据1924年3月《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四天所发表的记录，这次测验的问题共有10个，被测试者共1007人，其中学界752人（妇女只占47人），记者11人，军界9人，工界7人，政界11人，警界2人，商界8人（以上除学界外概无妇女），未注职业、性别者207人。测验的十个问题是：（一）你对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二）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么办？（三）你对于此次政府所颁布宪法应取什么态度？（四）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五）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六）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八）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哪一种？……。答题的人填写好测试表后，投入事先准备好的木箱，试毕由刘锡五、谢汝镇等十人启箱查验整理，最后由朱务善统计发表，这些意见，可以综合为两点叙述：

一、“就民主政体原则上说，其国之元首，必得大多数人之信仰与赞助，而后始能代表国人而行使其职权；其国会之议员，亦须国人重视而爱护之，而后始能代表真正民意，其国之宪法，国人尤须表示尊守、视为神圣，然后始能纳政治于轨物。今吾人所测知之结果，对于曹氏，则不信其为总统；对于国会议员，不曰解散逐走，则曰宰杀活埋；对于宪法，则多数表示反对，然则今日之北京政府，将不见信于国人矣。然则何为而可？曰：以‘国民革命’之手段，推翻其所不信之政府，拥护其所深信之中国大人物（按测试结果，指孙中山及当时代表共产党后来变为叛徒之陈独秀二人而言），建设其理想中之社会主义国家，此答者对中国内政之主张。排美连俄，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完全独立，此答者对中国外交之主张。二、国民

革命之成功，全靠学生运动之努力如何而定。故今日为学生者欲挽回国运而为政治运动，首宜认识其运动之目标与方法，特之以忠挚的牺牲奋斗之精神，勿高谈性理而远于实际，勿假借群众而便利一己，则吾人希望，庶可乐观云云。”（《五四时期的社区》（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5页）

平民教育讲演团现在只留下一批演讲者的姓名和演讲的题目，大部分讲演稿没有能够刊印出来并汇编成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演说史上的一大缺憾。

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时有团员39人，其中有后来的著名共产党人和其他方面的著名人物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许德珩、王光祈、罗家伦、康白清等。

1919年3月以后到1925年9月平民教育讲演团活动期间先后参加该团的有118人，这些人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杨钟健、高尚德、段锡朋、朱自清、朱务善、章廷谦、俞平伯等。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共参加会员157人，活动期长达七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讲演社团。

1919年3月，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与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任教务长的陶行知商量决定，以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及江苏省教育会的名义，聘请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来华讲学。这年4月，胡适发表《实验主义》一文，系统介绍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特别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月底，胡适赶到上海迎接杜威。5月2日，胡适在江苏教育会讲演，介绍他的老师杜威的思想梗概。杜威由其学生陶行知陪同，5月在上海、南京讲学。

杜威来华讲学的目的和其他作用我们不去管他，但对于讲演在中国的普及却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报刊开始刊登演讲词第二家是《晨报》副刊。该报1919年2月20日—26日刊登的是霍坚补记的《汤化龙在波士顿中华商会之关于“中

美国民性之比较”》演说词。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是现场速记的均不能算演说词。5月9日该刊有《杜威博士在沪讲演记》，5月12日—13日有潘公展记的《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演说词。6月17日—20日则有杜威讲演《美国的民治的发展》。从此，《晨报》副刊几乎每期都有演讲词刊登。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继《晨报》副刊之后大量刊登讲演词的第三家刊物，开始于1920年3月之后，而1920年11月之前所刊讲演词中杜威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杜威的讲演先后被《晨报》社编为“晨报丛书”第六种即《杜威五大讲演》出版，其中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十六讲，教育哲学十六讲，思想之派别八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六讲，伦理学十二讲，分上下两册出版，全书五百页有奇。此外，《新潮》社将杜威的《科学方法论》作“新潮丛书”出版，中华书局把杜威《思想派别》另出单行本，刘伯明翻译了杜威的《思维术》，方东美翻译了杜威的《实验主义》，都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20年底出版，真是一场热闹非凡的杜威热。

杜威在中国讲学达两年之久，除北京、上海、南京外，尚远到太原和济南。他于1921年7月回国，胡适在7月11日所作的欢送演说《杜威先生与中国》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他认为杜威留下的最有久远影响的是他的方法，即所谓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实际上，胡适把他的老师的影响高估了，五四以后涌入中国的新思潮中，影响最大并最终被中国人民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1920年春，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结束了他的政治活动，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学术生涯。7月，梁启超准备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9月，梁提议组织讲学社，该社被规划为一永久性团体，决定每年聘外国名哲学家一人来华讲学，

并且成立讲学社董事会，他提议由蔡元培（北大校长）、范源廉、蒋梦麟、熊希龄、张元济、王宠惠、张东荪、王博沙、张一麋、张謇、陈小庄（北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汪大燮、严修等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组成，经费由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不足之处依靠社会捐款，并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商定，由该馆每年助讲学社5000元，讲演稿交商务出版，版税归讲学社，以上经费都以三年为期计划。毫无疑问，讲学社是中国现代规格最高的讲演社团。

1920年10月罗素到达上海，第二天，由中国公学、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时事新报社、申报社六团体发起，临时又增加了基督教救国会，约一百多人出席的欢迎会。罗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主要讲了来华后的感觉与印象，他希望中国不要不分好坏抄袭别国，能自己开闢出一条新路，并要警惕西方近代的商贾主义。他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把教育放在第一位。这次演说由赵元任担任翻译。

上海讲学之后，罗素由赵元任和傅佩青陪同先到长沙，后到北京讲学。罗素来华前曾到苏联考察，他是反对苏联的。正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罗素在长沙演说，……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实际上做不到。’罗素……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采取十月革命的办法，无产阶级才能夺取政权，才能实行教育普及。

罗素讲学与杜威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比如罗素先到长沙，他刚一走，杜威就到了长沙。这两位外国著名哲学家的讲学活动在

学术上、思想上的社会效果我们估且不说，却确实推动了中国的讲演。

罗素的讲演《晨报》副刊从1920年10月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从1920年11月3日开始刊登。由于他们的带动，一时演讲成风。规模较大的有，1920年湖南驱张运动之后，谭延闿重执湘政，为了迎合潮流，粉饰升平，先后邀请杜威、罗素、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江亢虎到湖南讲演。总之，杜威、罗素的讲学促进了讲演在中国社会上层的普及，继《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之后，《少年中国》、《东方杂志》、《平民教育》、《新生活》等刊物也开始发表讲演稿，中国演说家的讲演稿也和外国演说家的一起在报刊上发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比较优秀的演说家有孙中山、梁启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杨杏佛、马寅初、汪精卫、江亢虎、沈玄庐、刘伯明、傅佩青、陈望道、张耀翔、陶行知、周作人、邓翠英等。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讲演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大众媒体，各种学会、各个高等学府举行学术讲演和时事政治讲演已成趋势，这一时期的著名讲演活动如经亨颐在春晖中学主持的暑期讲演，著名共产党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在上海松江主持的暑期学术讲演会都是十分成功的。

这个时期，有关讲演的著作也日益增多。1921年3月，梁启超为费培杰翻译美国吉森所著的《辩论术之实习与学理》作序，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讲演术专著。

1922年2月，《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出版，这本由杨维新编的梁在1920年10月到12月中的讲演7篇，是现代中国人出版的第一部演说集。1922年10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出版，全书分三辑，第三辑迟到1923年9月出版，共收他的讲演26篇。

1923年6月广州书店出版了《陈独秀先生讲演录》。

1923年9月，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的《马寅初演

讲集》第一集出版发行（1925年出版第二集，1926年出版第三集，1928年出版第四集）。

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出版的6本讲演集。

以上对我国近现代讲演初创期的历史的简单回顾，权作这本讲演选集的序。

李伏虎

1991年6月于兰州

目 录

中国现代演讲初创期历史的简要回顾·····	李伏虎 (1)
孙中山·····	(1)
在岭南大学黄花岗纪念会的演说·····	孙中山 (3)
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孙中山 (6)
陈独秀·····	(16)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陈独秀 (18)
抗日战争之意义	
——在武昌华中大学讲演·····	陈独秀 (20)
李大钊·····	(26)
今与古·····	李大钊 (28)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 (32)
廖仲恺·····	(40)
史坚如石像开幕演说·····	廖仲恺 (42)
救国的三要件·····	廖仲恺 (45)
章太炎·····	(47)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章太炎 (49)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章太炎 (58)
鲁 迅·····	(61)
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 迅 (63)
今春的两感想·····	鲁 迅 (69)
毛泽东·····	(72)